

■ 学人素描

胡祖六：从湖南湘阴走到国际金融前沿



◎ 蒯萍

胡祖六——一个给媒体印象深刻的经济学家，出生在中国内地，风华正茂时求学海外，目前是高盛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眼下，胡祖六思考最多的问题是有关中国金融体系建设问题。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凸显出他的经济学思考，也折射出他的独特关怀。

机遇垂青

跻身于顶级国际金融机构

1963年，胡祖六出生在湖南湘阴。少年时代，他的第一个机遇降临，那就是中国恢复高考。他说，当时根本不知道有“经济学”这个学科，由于“科学救国”很流行，所以就报考了力学，天资聪颖的他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并在清华获得了工学硕士。

在北京求学期间，他开阔了眼界，胡祖六也逐渐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的重要性。此时，恰好中国要向美国公派几位留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胡祖六从百里挑一的选秀中脱颖而出，得以进入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在那一班博士中，有着当今活跃在中国经济学界中的一些著名学者，包括许成钢、李稻葵、樊钢和王一江等。

“枯燥的经济学很有意思，仿佛大而无当，却和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汇率和利率的计算也非常有趣。”尽管胡祖六说起来语气相当轻松，但仍可窥视出他初到哈佛时所感受到的巨大压力。

作为哈佛几大著名经济学家的弟子，经过数年异常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在博士毕业后，胡祖六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世界著名的金融机构。

1991年到1996年期间，胡祖六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先后供职于亚太局、财政事务局和研究局，主要从事经济研究，并参与了对许多成员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磋商与技术援助工作。1996

年，他已经是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首席经济学家。当时“亚洲模式”正独领风骚。深受导师萨莫斯人风格影响的胡祖六，不禁心向往之。恰在此时，一位同学向高盛公司推荐了他。

高盛在世界十大投行中名列前茅，而这些投行都是世界经济生态链中接近顶端者。在这个生态链中，为跨国公司OEM加工生产者处在最底端，其上是一般传统的跨国公司，再上是如INTEL和IBM之类的高新技术产业垄断巨头，高盛等投行又在更上一层。最后，位于金字塔顶的是标准普尔、每年对投行的评价正是由标准普尔作出的。

“在投行模式中，高级经理人的经济学功力和话语权至关重要。唯有当你具有了足够的话语权，才能让别人愿意坐下来倾听你的声音，然后被你说服并让你替他在资本市场服务，这样你才能收取佣金。”而在高盛的眼中，胡祖六显然已经是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年轻、精力充沛决定了他能胜任投行的超级高负荷工作，更何况他还是中国人。一切条件都如此理想，注定了高盛与胡祖六的“一见钟情”。

1997年，刚到高盛赴任的胡祖六就遭遇了亚洲金融风暴。东南亚各国汇率极度动荡，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危机，有的国家经济甚至在一夜之间被称为“倒退十年”。

亚洲金融如同多米诺骨牌一个倒下之后，世界经济界自然产生下一个猜想，即人民币会不会贬值？中国会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西方的经济学家大多预言中国难逃此劫，但胡祖六却根据自己的研究分析断言：“人民币不会贬值！”在当时各种不利于中国的分析言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胡祖六的良好预期给人们留下了初步印象。事后，市场证明了胡祖六的预见。由此，他开始在国际资本市场也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游走于学界与外资投行之间的经济学家

胡祖六曾经说过：“我在国外投资者面前，更多讲中国的前景；而在

国内，更多讲问题和差距。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也许是他最坦诚的内心独白。

早在2003年，胡祖六即对外表示：不应把实行浮动汇率制和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开放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人民币汇率放开，依然可以对资本项目实行必要的管制。而2004年底，他更是宣称，汇率制度改革条件已经成熟。他的这些观点随着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而被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

同时，胡祖六亦在各种场合积极呼吁，国内相关机构应消除外资进入金融业的“非理性恐惧感”。他的论据之一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银行不良资产率与该金融开放程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因为，这些论断凸显出了他的过人判断力，他在国内的影响力与知名度也与日俱增。

当然，作为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胡祖六也同样切实履行着自己应尽的职责。2005年，股权交易和并购事件频繁发生，高盛参与了中国网通集团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收购案、平安保险公司10亿美元的股权出售案。高盛在亚洲的业务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上升了近二分之一，其中收入的50%来自于中国，超过了日本。业内人士透露，胡祖六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前中国经济最大风险是资产价格膨胀泡沫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开放之际，站在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进行全面竞争的起始点上，胡祖六眼下思考最多的是有关中国金融体系建设的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无论是中国制造业还是金融业，只有通过竞争，才能越做越强。”他说：“虽然目前中国对于外资仍然存在一些限制，但我相信，金融市场开放的步伐会越来越快，我相信中国一定会诞生一个健康、高效、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体系。”

对于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之后中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与合作，胡祖六认为，目前中国银行业的竞争绝大部分仍旧是本土银行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外资银行同中资银行之间的竞争。毕竟外资银行的网点、业务范围和资产规模等还是很小的。但是，外资银行进来，带来新的产品、理念和服务，可以促进中国金融市场更好发展。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培养比较有效率的金融体制。因此，竞争对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除了竞争，中外资银行之间有很多的合作，包括业务和培训等方面。“正是通过近距离竞争与合作，外资银行的很多产品和经验才能转移到中国来。”

国内商业银行发展投行业务方兴未艾，身为投行高层的胡祖六却认为这一问题需要谨慎对待，因为：“首先，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商业银行自身擅长的核心业务还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不只是未来1至2年，而是未来10年和

20年，甚至在更长的时间内，商业银行还是需要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和强化主营业务。”

“其次，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有很大的不同，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将会更多。在目前商业银行业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改进的情况下，盲目投入资源去发展投行业务具有很大的风险。”

“第三，从国际经验看，花旗、美洲银行、汇丰这些银行巨头，在发展投行业务方面也是经历了一条非常漫长、坎坷、曲折的道路，成效如何至今还无定论。最近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抵押证券化产品，给包括美林、贝尔斯登等在内的投行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也应引人深思。”

从胡祖六这位“海归”的经济学人身上，或许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知识分子特有的家国之忧，和以“经世济民”为怀抱的高度社会责任感。

“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是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虽然国内的粮食、猪肉等价格有所上升，但我认为CPI风险仍然处在一个可控的水平，而且粮食、猪肉等相对价格的高低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还是有所帮

助的，所以这并不是我最大的担心。”

“可是说到资产价格膨胀，就包括到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胡祖六说：“当前普遍存在一种盲目的乐观，认为股市和房市将会只涨不落，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我非常看好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但现在的股价已经和当前即使非常好的经济基本面发生了偏离，越来越具泡沫性。现在中国经济处在一个非常微妙复杂的位置，如何面对资产泡沫风险，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都已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如果这个泡沫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整，反而越演越大或变本加厉，最后将不可避免出现泡沫破灭的结果，这将给我国的投资者、老百姓的信心以及实体经济带来非常大的破坏力和不利影响。”

胡祖六给出的对策是：首先需要有果断的货币政策，充分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第二，除了利率与准备金比率的调整，汇率政策还有颇大的调整空间。如果汇率更灵活，就能够帮助更有效地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膨胀。最后，中国还应当更善于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 本期人物话语



奥运后相当长时间内经济仍可维持10%增幅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1月11日在参加“搜狐2008中国新视觉高峰论坛”上表示，奥运会后中国经济不会转向萧条，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可以维持在8%至10%的增长幅度。

■ 多声道

促进优秀海外上市公司回归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在1月12日北京召开的第十二届(2008)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指出，要促进我国优秀海外上市公司的回归。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从注重量的扩张，到注重质的提升。在这些活动中，金融体系必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伴随中国宏观经济未来长期的良好增长态势，和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水平的稳步提高，中国资本市场必将更快地融入全球经济。

国有上市银行治理结构还需完善

孙晓霞(财政部金融司司长)1月8日在“《财经》论坛：上市银行的进阶之路”上指出，下一步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还需要不断完善，应从制度规范和法律上保护上市银行国有控股股东的利益。目前的制度设计对上市银行的国有控股股东利益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法律上的保护；国有控股股东的自我保护也受到制约；而且，由于国有控股股东的股权管理职能还是分散在政府不同部门的“九龙治水”的局面，缺乏统一的经营战略，从而导致各股东在银行经营决策中，有时存在一些看法不一致，影响有效行使国有股东权利。对此，应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更要在立法上加强对国有金融资产的保护力度，在制度上防止国有控股股东利益被侵占，确保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

全球经济增长有力 通胀压力犹存

特里谢(欧洲中央银行行长)1月7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10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说，从全球发展水平来看，我们能够看到全球经济增长的步伐依然有力。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充满活力，其发展并没有受到美国次贷危机中的严重影响。但是，美国次贷危机对金融市场的冲击和食品价格走高对通货膨胀构成了很大压力。全球经济将面临通货膨胀压力、股市调整、高油价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风险。

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发展道路

高强(中国卫生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月8日在2008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发展道路”，盲目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卫生发展模式，就会发生失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发展道路的基本内容是：一个方向就是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一个本质是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一个方针是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一个体制是实行行政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一个保障就是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一个重点是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一个目标就是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赵迺抃：雪泥鸿爪自成品

◎ 蒯捷

北大已故经济学家赵迺抃先生的家属汇编了一本书——《雪泥鸿爪——赵迺抃文集》，收录了赵老先生生前公开发表过的总共78篇长短文章，以前并没有公开出版，只是印了一些分赠亲友。我有幸收到一本。认真翻阅一遍，对赵先生的学问和人品又多出几分敬佩。

好几年前，我在翻检民国旧书时，偶尔看到赵迺抃先生所著的《欧美经济史》，大感惊异。这本书资料翔实，评论中肯，质量远胜于现在市面上国人编著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它出版于1948年，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而当时，我对赵迺抃是谁，完全一无所知。

后来读到材料多了，才逐渐了解赵先生的生平。赵迺抃(1897—1986)，字廉澄，杭州人。父亲是小学校长，后来又担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但家庭条件并不富裕。赵迺抃上过私塾，后转入新式小学，主要学习是古籍。他曾一度师从沈钧儒先生，故国学功底非常好，这为他日后政治经济思想史打下了基础。

他中学在杭州府中学就读，练就了出色的中英文底子。赵在1915年顺利考入北大预科，苦读中、英文，于1918年毕业。当时，赵的杭州同乡马寅初刚刚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应聘于北大，无限风光。赵决心跟着马寅初攻读经济学。可惜北大在很长一段时间并无经济系，赵就读了法科经济门的学位。

赵在北大读书时，条件十分艰苦，必须半工半读。比如，他曾长期给俞同龢的几个孙子上下外语课，又为了报答中学校长钱家治对他的资助，一直去给当时还上中学的钱学森补习中英文，空余还从蔡元培任馆长的国史馆里接零活，翻译过一部《希腊史》。

毕业以后，赵迺抃参加官费留美考试，名列第一，终于有机会赴美留学。赵迺抃选择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因为他的导师马寅初毕业于此。接下来的7年，赵迺抃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苦读，几乎足不出户，整整几年没出门看过什么电影。

哥伦比亚大学名师甚多，有两人对赵迺抃最为重要，一是米契尔，一是赛利格曼。米契尔研究“经济周期”理论，是当时国际上最热门最前沿的学问，后来中国国内亦有不少学者致力于此。赵迺抃明知米契尔治学最苛刻，仍然选择他作为硕士论文导师。他的硕士论文《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比较研究》顺利通过，并获得好评。

在博士阶段，赵迺抃跟着赛利格曼研读经济思想史，从而开辟了学问的另一阶段。赵迺抃跟着经济思想史大家赛利格曼学思想史，偏不想做什么“中国经济思想”，倒想挑一个西方人来研究研究。

他与赛利格曼最后商定，研究英国早期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的理论。赵迺抃为此四处搜集材料，他竟搜到了琼斯著作16种，研究琼斯的书籍74种及论文52篇，还有大量书信。由此，可见赵迺抃治学的认真和细致。赵迺抃在此基础上写出论文，并确立了琼斯作为“早期制度经济学家”的历史地位。

抗战以前，赵迺抃发表的文章几乎全是关于纯粹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与现实问题少有联系。赵迺抃准确地引入西方最新的经济理论如信用消费、价格理论、动态经济、商业循环(即今日之经济周期理论)等方面的理论，语言平实而准确。同时，赵迺抃在经济思想史方面亦已展示出极高造诣。1936年是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160周年，赵迺抃写了一篇《国富论学说述原》，把斯密思想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他在材料上下过极大功夫，所引用的相当一部分材料都很罕见，至今还没见过什么其他经济学家研究过。

抗战爆发，赵迺抃随着队伍一同去了云南，继续在西南联大任教。北大的赵迺抃与清华的陈岱孙到西南联大经济系教育贡献最大，又要组织教学，又要开设多门必修课和选修课程。此外，赵迺抃抽空在昆明鹅塘边写完了《欧美经济史》初稿。

抗战以后，赵迺抃发表文章的风格却一下子有了转变，正应了他自嘲“不将心事付烟霞”的题诗。赵迺抃积极思考着战后重建问题。可是，在恢复经济秩序的过程当中，物价飞涨，官僚机构堕落，中国经济体质向着崩溃的方向大步迈进。赵迺抃认为，问题的根本在于官僚资本垄断，在于制度建设腐败。

赵迺抃写了大量批评当时政府政策和财政手段的文章，反对金圆券，直陈其弊。1947年时，他还与刘大中、中等经济学家一起发表了“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的公开信，再次批评政府，试图挽救经济。可惜一切努力都已太晚。

1953年以后，赵先生失去再上台的机会，他把讲义留给其他老师，自己则专心投入古代经济思想史的汇编整理。30年间，他手抄了8000多张卡片，600多万字，汇编起来定名为《被沙录》。全书在1986年他去世之前完成，共分5卷，北大出版社出了2卷。据说由于市场等诸多方面原因，20年过去了，剩下的3卷还是未能与读者见面。

■ 美加观潮

酒：超市不卖哪里卖

◎ 何祖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在人种互相隔绝的情况下各自发明的，比如酒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美酒佳酿谁人不喜，沾酒买醉一直是一大社会问题。许多国家都有过长期禁酒的历史。

现代社会中，醉酒驾车一直困扰着人们。加拿大规定20年以下驾照的只能喝一瓶啤酒，20年以上驾照的可以喝两瓶，都是那种小瓶。超过者轻则罚款，重则坐牢，即便是这样严格的规定，还是有不少人控制不住，以身试法。

但是，有一些民间组织很有效。他们的家属亲友被醉酒者驾车致死或致残，于是他们出于义愤自发组织起来，专门盯着酒吧舞厅，看有些明显过量的人出来驾车，便记下车牌跟踪，到一定程度便报警。警车呼啸而至，逮个正着。于是他们不是吊销执照就是上法庭去监狱。

所以，现在朋友聚会一般都不敢轻易碰酒，或者喝了酒过几个时辰再上路。一次我们去机场接朋友，路上正遇到警察检查，因为喝过一点酒，所以我们很紧张。警察过来叫我们放下车窗，他谨慎地把头凑过来，意在闻车里的酒气味，说话时又有意凑近驾驶员，闻他口中的气息，但看得出来他也很警惕，屁股上的手枪高翘着。好在我们喝完酒后的间隔时间已经很长，已经没什么酒味，他也没拿出测酒精的器具，友好地说了声抱歉，并拿出一张5加元的电话卡作为奖励。我们一时有点意外，赶紧说谢谢。我们启动后发现已经有一辆车被扣住了，驾车者一脸沮丧。不知什么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喝酒和抽烟一样，其声誉每况愈下。酒在加国是管制得很严的。首先在超市绝对买不到酒，包括啤酒。一切酒必须在专卖店才能买到。在这种

钱不是为了解决温饱，而是为了沾酒买醉。这就是警察和当局一再告戒市民不要给他们钱的原因。有些无家可归者实在没办法就到唐人街买料酒喝，即便如此，无家可归者照喝不误，因为比起专卖店的酒来，做菜的酒实在太便宜了，一般在1-3加元之间。于是，你在公园里经常会看到中文标贴的料酒瓶。

设专卖店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防止青少年喝酒。不到年龄不可以喝酒，大型的游艺活动和演唱会也禁售酒类饮料的。酒确实能助兴，特别是狂欢的时节。但酒也最能乱性，多少罪行错失都是在醉酒的情形下发生，多少家庭的破碎都是因为杯中物引起的！更别说对肝脏的伤害之巨。有人在酒店门口做了一个大雕塑——肝脏，就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过量饮酒，以免伤害肝脏。

英语有一个词叫“SOBER”，说的就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醒”。这种醒不是很好吗？